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考茨基言论

(供内部参考)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考 茨 基 言 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列 宁 斯 大 林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2 024 1809 9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

考茨基言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列宁 斯大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1966年5月第1版

1973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3002·130 每册 1.55 元

内部发行

1026.006/20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資料选編》

說 明

这套《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資料选編》，是根据已收集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主要的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編譯的。全套书按人分册出版，所收材料依写作或发表時間的先后順序排列，书后附有各人的簡要大事年表。

在每篇文章之前一般都加有編者按語和內容提要。按語扼要介紹文章的历史背景、基本論点以及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这些机会主义論点的批判。內容提要基本上采用作者的原話，某些地方作了改写。

为了便于閱讀，正文中較重要的地方用黑体排印；原著的着重号，一律用黑点标出。

材料的选择和編譯如有不妥之处，希望讀者指正。

前 言

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領之一，“中派”的代表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考茨基的修正主义思想曾經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过极为严重的腐蝕和破坏作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第一次大論战中，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主要方面。

考茨基于一八五四年出生在布拉格(当时属奥匈帝国)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画家，母亲明娜·考茨基是演員和作家。考茨基九岁时随家庭迁居維也納，一八七四年入維也納大学哲学系学习，一八七五年一月加入奥国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在中学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統治和民族压迫政策不滿。他把奥国当时的工人运动看成是一般的民主运动，其中沒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下，他开始閱讀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是他受路易·勃朗、拉薩尔、杜林、阿尔伯特·朗格等人的影响远比受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多。在加入社会民主党时，考茨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相当肤浅和混乱，也沒有阶级斗争的实践。他的哲学观点是折衷主义的，政治观点是改良主义的，他还談不上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供认，他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期，“极不同情馬克思的理論”，“对于馬克思理論曾采取批評的和不信任的态度”。^①

^① 考茨基：《土地問題》，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9 頁。

一八八〇年，考茨基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卡尔·赫希柏格的聘请，到苏黎世为他所出版的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年鉴》、《政治经济学论丛》撰稿，并且在他的资助下研究历史 and 经济学。这时，考茨基同担任赫希柏格私人秘书的伯恩施坦相结识，二人“情投意合”，考茨基把伯恩施坦看成自己的“有力的引导人”。^①

考茨基在苏黎世接触了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一八八一年他随倍倍尔到伦敦初次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他给马克思的印象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是个天生的俗种。”^②恩格斯也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③

从那时起到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为止，考茨基一直同恩格斯保持通信关系，在写作方面得到他不少具体的帮助，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〇年间移居伦敦时更直接受到恩格斯的指导，因此写出了一些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八八三年，考茨基在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恩格斯的支持下创办《新时代》杂志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并担任这个杂志的主编。一八九一年考茨基到德国以后又以这一身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活动，担负了起草爱尔福特纲领的工作，屡次代表德国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由于这些情况，考茨基成了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载于《近代国民经济学说的自述》，莱比锡1924年德文版，第1卷第1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211页。

党的重要領袖和理論家。然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考茨基“从来不是一个在严重危机时期能立刻站到战斗的馬克思主义立場上来的人。”^①在反对拉薩尔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孟什維主义等等斗争中，考茨基总是公开或隱蔽地站在机会主义者一边。

考茨基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經不时流露出机会主义观点。例如，他在《爱尔福特綱領原則部分解說》（一八九一年）、《議會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三年）、《社会民主党的教义問答》（一八九三年）等著作中，虽然重复了不少馬克思主义的詞句，但是他却违背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暴力的根本原理，宣揚了通过議會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謬論，說議會“是为各个极不相同的階級利益服务的”，甚至說議會斗争是“使无产階級上升，摆脱經濟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的杠杆”。他借口革命形式的多样化，反对无产階級的暴力革命，鼓吹統治階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这些机会主义观点随着階級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尖銳化而不断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終於形成了关于无产階級革命、无产階級专政、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問題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理論。考茨基修正主义的特色是极端虛伪，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是糟蹋馬克思主义的头号伪君子和能手”，^②考茨基主义是“隱蔽的、胆小的、虛伪的、甜蜜的机会主义”。^③

十九世紀末，由于德、法等国的資產階級統治者普遍轉向采取“自由主义”的策略，軟硬兼施地对付工人运动，第二国际各党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濫起来。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也大大受到鼓励。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說：“自从一八八〇年法国赦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21卷第78頁。

② 同上书，第234頁。

③ 同上书，第428頁。

免公社逃亡者以来，自从一八九〇年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以来，即使还没有具备非暴力地取得政权的条件，但毕竟已经有了进行宣传和组织的民主条件。这终于不可能不对我们的言论和策略发生影响。……我自己也相信，民主制度会引起我们活动形式的许多改变。”因此，当伯恩施坦一八九六年开始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时，考茨基表示“深有同感”。^①

考茨基不但在《新时代》上发表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文章，不加任何评论，而且还私下写信给他表示支持。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讨论伯恩施坦问题时，考茨基作了调和主义的发言。在一九〇〇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关于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事件的争论中，考茨基提出了一个折衷主义的决议草案，宣称社会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个非原则性的策略问题，从而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隙。考茨基的动摇态度曾经受到第二国际各党左派的批评和指责。

虽然考茨基在党员群众反修正主义斗争的压力下，曾作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发表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一八九九年），同伯恩施坦进行论战。接着又发表《社会革命》（一九〇二年）、《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九〇九年）等书，阐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国家问题上恰恰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②考茨基假惺惺地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同时却声称武装起义和街垒战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甚至不能“打垮”“最软弱、最昏愤的政府”，

①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载于《近代国民经济学说的自述》，莱比锡1924年德文版，第1卷第135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25卷第464页。

认为“在原則上决定采取起义的道路”“一定是发疯了”，使用暴力手段“并不是絕對必要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手段越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著作充分反映了考茨基修正主义观点的发展过程。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以后的几年内，欧洲各国工人屡次举行大规模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甚至发生同军警的武装冲突。考茨基一方面口头上谈论革命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却对这些斗争采取老爷式态度，说什么“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常的和正常的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曾经就此同考茨基展开激烈的论战。

一九一二年，荷兰社会民主党员潘涅库克写文章揭露考茨基对待革命的消极态度，同时尖锐地提出了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問題。考茨基发表了《新策略》一文反驳潘涅库克，诬蔑他是“群众行动痴”，并且用“权威”的口吻宣称，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的，只能是“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这句话彻底暴露了考茨基的真面目：一个十足的议会痴，把议会斗争看成工人阶级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害怕革命，嘲笑一切革命意图，反对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考茨基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代表了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中派。中派是一个隐蔽的机会主义集团，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力图使左派服从右派，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资产阶级利益。列宁曾经指出，“‘中派’是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僚。”^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24卷第54页。

考茨基修正主义理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和平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二十世紀以来，战争与和平問題成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問題，在第二国际的历次大会上都列为重要議程。经过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的斗争，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反对軍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決議或宣言，指出資本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有在資本主义制度消灭后战争才能消失，号召各国工人尽力阻止战争，并且在战争一旦爆发后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經濟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資本主义的統治。考茨基对待这些決議采取了两面手法，表面上投票贊成，实际上进行直接违背決議精神的宣传活动。

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論述战争与和平問題的文章。他抹杀战争的帝国主义根源，却把各国的軍备竞赛和所謂“相互不信任”說成战争的原因，发出“不是战争，就是裁軍”的叫嚣，鼓吹各帝国主义国家在“相互諒解”的基础上达成关于裁减軍备的国际协定以“保障”世界和平，并且散布裁軍节省下来的錢可以用来援助落后国家的謬論。考茨基用这些社会和平主义的幻想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掩飾帝国主义准备世界战争的計劃，成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帮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領導集团公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墮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支持本国資產阶级政府进行战争。这时，考茨基繼續站在中派即隱蔽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場，帮助右派欺騙工人阶级和党员群众。考茨基曾經向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的領導献策，要他們在議會表決战争撥款案时弃权，或者只在“政府保证不使战争失去純粹防御性质”的条件下才投贊成票，以便更加巧妙地粉飾他們的叛徒行为。考茨基在《战争》、《战争的影响》、《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和战争》等文章中竭力掩飾战争

的帝国主义性质，为第二国际的叛卖行为辩护，号召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保持同右派的“团结”，服从右派的领导，同政府合作，去屠杀其他国家的阶级兄弟。

为了给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披上科学的外衣，考茨基在大战期间精心捏造出“超帝国主义”谬论，在他所著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再论我们的幻想》等著作中大加发挥。“超帝国主义”论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否认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夕，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缓和下来，会出现一个用国际金融资本的联合代替相互斗争的所谓“超帝国主义时代”。考茨基劝告工人阶级不要“过早地”谈论资本主义的破产，而要等待这个新时代到来后才夺取政权。列宁指出，这是“更巧妙更隐蔽地（因而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妥协”的谬论，它“不是暴露矛盾有多么深刻，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记其中最重要的矛盾”。^①

到大战后期，当帝国主义需要结束战争以便“和平地”进行分赃和阻止本国革命爆发的时候，考茨基适应这一需要，直接运用“超帝国主义”论来为正在策划中的和议辩护，说什么帝国主义的协议也许能“带来世界和平”，甚至“保障世界和平”。列宁严厉谴责了这种反革命言论，指出这种行径“就是转移群众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将来所谓新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的前途，用这种极为反动的办法来安慰群众，使他们抱着在资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②

在战争过程中，德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战和革命情绪不断高涨，社会民主党右派的露骨的沙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22卷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287页。

文主义言行愈来愈不得人心了。为了緩和革命群众同机会主义领导之間的矛盾，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人作出了向“左”轉的姿态，在一九一五年发表以《当务之急》为題的呼吁书，玩弄“和平”詞句，用对兼井政策等等的空泛的指責来迷惑群众。列宁指出，这一夥人的“轉变”是“粪土一般的轉变，他們已經料到群众不会再忍耐下去了，‘必須’向左轉，以便繼續欺騙群众”。^①此后，考茨基繼續对右派领导进行溫和的批評，并且糾集其他中派分子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吸收对右派领导不滿的社会民主党員和工人入党。考茨基和这个党的领导在党内貫徹了用謊言掩护右派叛卖行为的路綫，因此这次分裂仍旧是欺騙群众、阻止群众脱离机会主义领导、轉向革命和建立革命政党的一个步驟。

在整个大战期間，考茨基起初用“保卫祖国”的口号、后来用资产阶级的“和平”口号同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对立，用无原則的“团結”口号同列宁的与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路綫对立，用“恢复国际”的口号同列宁的在革命基础上成立第三国际的主张对立。由于考茨基在第二国际中享有較高的声望，他的伪善面目同露骨的沙文主义比起来有着更大的欺騙作用，因此，考茨基主义成了毒害国际工人阶级的思想、阻碍第二国际左派的发展、破坏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危险。考茨基主义成了国际性的思潮，甚至迷惑了一部分左派領袖，从而在列宁所领导的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問題，成了关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全局的战略問題。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就说过：“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鳴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他想蒙蔽一切和掩盖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36卷第328頁。

切，想用詭辯和似乎是博學的廢話來平息工人的已經覺醒了的心的。”^①在一九一五年七月他又說：“工人階級若不无情地反对（考茨基）这种沒有气节、实行叛变、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論上把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作用。”^②列宁在大战期間用很大的力量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并且正是通过同考茨基主义的斗争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

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大促进了德国工人階級的革命化和党内左派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成熟了。这使考茨基吓坏了，他在《自传》中說：“当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看清楚俄国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以后，我立刻认为我有义务挺身而出，既反对那种认为象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能够在工业的西方之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反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由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在同多数居民相对立并且不得不用武装暴力和恐怖来控制他們的情况下，通过几下沉重的打击就建立起来的幻想。”^③为此，考茨基从这时起直到死去，接連不断地发表文章，瘋狂地攻击十月革命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一八年夏天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是考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問題上的修正主义理論的最完整的表述。考茨基粗暴地歪曲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論断，掩飾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內容，吹嘘所謂“純粹民主”和“一般民主”，侈談“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他特別凶惡地攻击布尔什維克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是像一个怀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35卷第152頁。

② 同上书，第21卷第291頁。

③ 考茨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載于《近代国民經济学說的自述》，萊比錫1924年德文版，第1卷第144頁。

孕妇女瘋狂万分地猛跳而引起早产，并詛咒“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他吓唬无产阶级說，如果以暴力夺取政权，“革命必然以克伦威尔或拿破伦式的統治而告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全面而严正地駁斥了考茨基的謬論，彻底揭露了考茨基的叛徒嘴脸。列宁說：考茨基“奴顏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他的每句話里都充滿了十足的叛徒精神”，“用大量的民主空話来抹杀无产阶级革命”，使“革命暴力化为烏有”；他“在对馬克思主义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沒有絲毫差别，連一点差别的影子也沒有”。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了。但是社会民主党右派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成立了反革命的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领导的左派即斯巴达克联盟同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时，考茨基获得了把他的叛徒理論付诸实践的机会。他曾在这个政府里担任短期的外交部副部长。他积极支持右派召开资产阶级式的国民议会的主张，反对斯巴达克派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资产阶级准备血腥镇压革命的前夕还竭力为反革命专政掩飾和辯护。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杀害之后，考茨基竟把劊子手謝德曼和諾斯克之流仍旧称为“社会主义者”，大談什么由“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組成“法庭”来审讯凶手，企图借此为謝德曼等开脫罪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考茨基参加了恢复第二国际的活动，并且竭力推动独立社会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以帮助右派爭夺和巩固对工人运动的領導权。

反革命政府为了装点門面，抵制革命群众对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曾經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設立一个“社会化委员会”，考茨基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同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教授一起“研究”“社会化”的时机和方式問題。正如《前进报》所供认的，“社会化委员会的任务根本就是安定人心，要叫大家不必害怕会作任

何不合理的实验，至少任何一个想重理战前旧业的人都将不会受到损失。”^①到一九一九年一月，“社会化委员会”就无声无息地解散了，没有一个容克，也没有一个垄断资本家的财产遭到没收。在这场短暂的滑稽剧中，考茨基又一次扮演了可鄙的丑角。

一九一九年发表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续篇。考茨基在这里“用对内战的喧嚣、号哭和歇斯底里来掩盖他的破产”，^②疯狂地攻击苏维埃政权实行恐怖主义和取消民主，“是俄国迄今有过的一切暴政中最暴虐的一个”。同时，他更加嚣张地宣扬和平过渡，断言世界革命“不会通过专政的道路，不会依靠大炮和机关枪，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敌人来实现，而是通过民主和人道来实现”。列宁在《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一文中，无情地痛斥了考茨基“直接替资产阶级帮腔”的反动言论。

考茨基还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自由派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九二〇年八月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他应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邀请到格鲁吉亚访问并参加关于“宪法草案”的讨论。孟什维克把他当作“导师”，吹捧他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之父”。在访问期间，他写了《格鲁吉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农民共和国》一书，竭力吹捧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用民主的方法在得到多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治理，而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③

考茨基回到德国以后，继续进行促使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活动，并且为修改党纲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及其

① 转引自《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7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3页。

③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载于《近代国民经济学说的自述》，莱比锡1924年德文版，第1卷第148页。

綱領》一書。這本書是一個完整的社會改良主義綱領。他在書中篡改了馬克思關於過渡時期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的著名原理。他說“在民主國家的純粹資產階級統治時代和純粹無產階級統治時代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政府通常將採取聯合政府的形式。”一九二五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海德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黨綱，就是以考茨基的這一著作為基礎的。

一九二四年以後，考茨基遷居維也納，參加奧國社會民主黨領導機構的活動，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由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合併而成）仍舊保持着影響。在考茨基一生的最後十幾年中，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寫作上，力圖將自己的修正主義理論拼湊成完整的體系。

一九二七年，考茨基發表兩大厚冊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在其中論述了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方面一系列的修正主義觀點。有一個批評家正確地指出，這部書是“考茨基和他的一夥在最近幾年完成的從隱蔽修正主義到公開修正主義的過渡的概括說明”。^①考茨基吹噓這一著作是他“一生工作的結晶”，狂妄地宣稱要為歷史唯物主義“建立一個我們至今缺乏的、非常迫切需要的深入的基礎”。^②實際上這部書無論就哲學觀點還是就內容來說都是一種折衷主義的雜燴。例如，他竟販賣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要把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領域“擴大”到生物學範圍，妄想發現什麼“人類發展和動植物發展所必須共同遵循的普遍規律”。^③

① 卡·科爾希：《唯物主義歷史觀，與卡爾·考茨基的爭論》，萊比錫 1929 年德文版第 4 頁。

② 考茨基：《唯物主義歷史觀》，柏林 1927 年德文版，第 1 卷第 V 頁。

③ 同上書，第 630 頁。

此后，考茨基开始系统地研究战争问题。一九二八年十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为了应付人民群众反对政府制造装甲巡洋舰的斗争，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国防问题的委员会来筹划对策，考茨基应邀给这个委员会提供意见，写成《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一九三二年，他发表《战争和民主》，一九三七年发表《社会主义者和战争》。考茨基在这几部著作里，大肆渲染战争恐怖，散布和平主义幻想，吹捧国际联盟和美帝国主义，诬蔑和反对被压迫民族的反帝解放战争，甚至明目张胆地为德国军国主义辩护。

考茨基同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一唱一和，大卖力气，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煽动。一九二五年，他发表《国际和苏俄》一书，向帝国主义国家献策，要它们通过借款对苏联施加压力，迫使苏联向资本主义让步。他还叫嚷要支持苏联国内的反革命暴动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一九三〇年，当苏联的工业化在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农业全盘集体化也大规模展开的时候，考茨基的反苏叫嚣就更加起劲了。他写了《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书，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一片黑暗，公然号召苏联国内外的敌人联合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甚至为此拟定了政治和经济纲领。考茨基的反革命妄想一次再次落空以后，他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变本加厉，在他三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充满了对苏联，对列宁和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疯狂的污蔑和攻击。

由此可见，考茨基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死去为止都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忠实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牧师和应声虫。他被反动的资产阶级文人视为“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权威”，^①被修正主义的后辈尊为“马克思学说的保卫者和发展者”，

^① 见悉尼·胡克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纽约1946年英文版）写的绪言。